

## 巴以冲突与中东局势走向

### [编者按]

巴勒斯坦与以色列自去年 9 月爆发武装冲突以来,国际社会为实现双方停火作出了不懈努力,但均未奏效。今年 8 月中上旬,流血冲突再次大规模升级,中东局势急剧恶化。与此同时,以色列有关重新占领巴勒斯坦自治区的军事计划被国际媒体曝光,沙特阿拉伯驻英大使公开撰文称“新的阿以战争不是不可想象的”。一时间,围绕流血冲突会否导致新的中东战争、十年和平成果会否因此毁于一旦,国际舆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东局势再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为此,本期我们特邀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 5 位专家举行对谈,就巴以冲突与中东局势走向进行深入探讨。

### [主持人]

李绍先:第三世界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 [对谈者]

李 荣:西亚非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赵宏图:西亚非洲研究室副主任,博士

宿景祥:世界经济室副主任,博士

高祖贵:世界政治室博士

### 形势逆转

绍先:巴以大规模流血冲突迄今已持续一年,阿以持续 10 年的和平进程遭受沉重打击。在去年 9 月底冲突刚起时,有关各方尚对缓和冲突“倾注很多热情”,希望能尽快平息战火,使和平进程列车重上正轨。然而形势的发展与人们的意愿相反,局势不仅未能缓和,反而一步步滑向失控的方向。现在,国际社会普遍对中东和平进程表示悲观,不知诸位如何看待当前的这场冲突。

荣:我认为,此次巴以冲突有其必然性,具体而言则是双方最终地位谈判失败引起内部反弹导致的结果。去年 7 月,在克林顿主持下,巴以在戴维营举

行最终地位谈判,就耶路撒冷地位、巴勒斯坦难民回归、犹太人定居点及边界划分等问题进行“最后冲刺”。然而,现在看起来,这次“冲刺”未免有些操之过急,会谈取得突破所必备的条件并不具备。从以色列方面看,当时的巴拉克政府风雨飘摇,联合政府内部四分五裂,连副总理兼外长利维也挂冠而去,巴拉克总理本人不得不身兼 8 个部长的职位。启程赴戴维营的当天,巴拉克仍不得不在议会与反对党利库德集团提出的不信任案苦战,勉强保住了执政地位。试想这样一个总理怎么能在最终地位谈判(要一揽子解决巴以近一个世纪的冲突)中有所作为呢?尽管巴拉克口口声声要做痛苦的妥协。从巴勒斯坦方面看,条件差得就更远了,特别表现在耶路撒冷问

题和难民问题上。耶路撒冷是阿拉伯世界和全球穆斯林的圣地,而难民问题也牵扯广泛,阿拉法特根本做不了主。会谈不欢而散是必然的,但企盼和平的人们的胃口被吊起来了,那些反对和平的势力也蠢蠢欲动。显然,巴以领导人均无力应对失败后面临的复杂局面。2000 年 9 月 28 日,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强行登上圣殿山并进入阿克萨清真寺终于点燃了巴以冲突的暴力火种。

绍先:把此次巴以流血冲突定位为去年 7 月最终地位谈判(戴维营会谈)失败而引起的“反弹”是比较客观的。事实上,在和平进程的发展史上,这样的“反弹”已经不止一次了。

荣:是这样的。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阿以双方的领导人都认识到通过军事手段不可能将对方消灭。于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埃及率先开始与以色列寻求政治解决途径。1979 年在美国直接干预下,埃以达成《戴维营协议》,实现“单独和平”,并根据协议分期收回了被以占领的西奈半岛,开创“以土地换和平”的先例。但此举遭到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反对,埃及为此被开除出阿拉伯联盟,刚刚起步的和平进程被搁置。这可以说是和平进程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形势大逆转或大反弹。

绍先:大进展必然伴随大“反弹”,这是中东的“政治逻辑”。事实上,在中东和平进程 1991 年 10 月底马德里和会重新启动到此次巴以流血冲突前,和平进程形势也有过一次大逆转。我们都知道,巴以和平进程真正取得进展是在 1992 年 7 月以色列工党拉宾政府上台后的事。1993 年 9 月巴以达成《奥斯陆协议》,1994 年 8 月约以签署和约。但 1995 年 11 月,拉宾因“推进和平进程过快”而遭以极端分子杀害,以此为标志,巴以和平进程形势也曾出现过一波大的“反弹”。这一波“反弹”持续了三年多,包括 1996 年初的恐怖暴力活动高潮及由此导致的右翼利库德集团上台和内塔尼亚胡为时三年的执政。因此,目前正在经历着的巴以冲突可被看作中东和平进程史上和平形势的第三波“反弹”。其中,后两波“反弹”均是以恐怖暴力潮开始,并都导致以色列

右翼上台执政,而右翼政府处理危机的政策对局势的发展都起了消极的作用。

高:我认为沙龙政府的强硬政策比内塔尼亚胡有过之而无不及。沙龙顽固坚持“无情报复”和“不停火、不谈判”的强硬政策,凭借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完全无视巴方的自治权利,多次入侵杰宁、希伯伦和伯利恒等巴控区。同时,以军还对巴方高级领导人进行“定点清除”,用导弹将巴解组织二号人物、人阵总书记穆斯塔法炸死在其办公室内。无疑,以色列政府所为对流血冲突不断升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沙龙曾暗示,他已经找到了对付巴勒斯坦人长达 11 个月“起义”的方法,那就是武装袭击巴控城镇与突击暗杀、空中打击、封锁巴控区相结合,最终耗尽巴勒斯坦的力量,直到巴方不得不让步。但是,沙龙自认为“周密复杂的游戏”并未给他带来任何回报,相反却使局势趋近于发生重大突变的临界点。我认为,如果以方继续执行已有政策,在紧张局势长期持续的情况下,随时可能因偶然事件引发出乎人们意料、且各方均不愿看到的结果。

绍先:巴勒斯坦方面是不是对局势的恶化也有责任呢?

赵:当然了,一个巴掌拍不响,巴方也有责任。实际上,奥斯陆协议规定的 5 年期限早已过去,巴自治机构迄今仍只直接间接控制着约旦河西岸不足 40% 的土地,多年的和平进程也没有给巴勒斯坦大众带来多少实惠,在巴勒斯坦朝野和民众中不满情绪是广泛存在的。据说,阿拉法特在戴维营会谈失败后回到加沙时受到凯旋式的欢迎,万人空巷,场面据说可以和当年他返回时类比。以色列方面一直咬定,阿拉法特利用巴民众情绪(包括巴激进势力)向以色列和国际社会施压,但实际上,正是巴民众的激愤情绪限制了阿拉法特控制局势的能力。目前,哈马斯等激进势力大行其道,200 多名“活着的烈士”随时准备身负炸弹从容赴死。巴以冲突早已成为恶性循环。

## 巴以角力的背后

绍先:在中东和平进程已历时十年并取得一系

列重大成果的情况下,巴以大规模流血冲突竟能够持续一年之久,且迄无任何平息迹象,这不能不令人深思。显然,有一系列因素在发挥着作用。

高:我觉得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以色列国内政治和舆论“鹰派”占了主导地位,“鸽派”代表人物佩雷斯虽身为副总理兼外长,但作用和影响受很大限制。沙龙上台后的民意调查表明,多数以色列人认为他是好总理,并支持他处理冲突的方式(冲突严重升级后民意有所改变)。第二,以巴力量对比差距悬殊,巴方长期处于屈辱状态,阿拉法特既不能完全控制巴各派力量,停止针对以的暴力活动,也没有多少余地可以作出妥协。他所能做的就是尽量保持克制,争取更多的国际同情和支持。第三,阿拉伯国家尤其埃及、叙利亚、约旦等“前线国家”,虽然强烈谴责以的强硬政策,在外交和道义上表示支持巴,但谁都不愿意过分得罪美国甚至以色列。它们所能做的就是既安抚国内反以反美呼声,又呼吁美国对以施压。第四,国际政治基本格局和美国的中东政策客观上支持目前的僵局。冷战结束后,美通过海湾战争沉重打击了中东极端势力,显示了一超独霸的威力,之后又推行“东遏两伊、西促和谈”的中东政策,在波斯湾对伊拉克和伊朗实施“双重遏制”,同时大力推动阿以和平进程,改善与温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美在中东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中东局势如何发展在一定程度取决于美的意愿。小布什上台后,全面重新评估包括中东在内的对外战略和政策,而克林顿卸任前推动巴以和谈的努力失败,也更多地使布什认识到中东问题的风险。因此,美对巴以冲突的调解一直不是很卖力,特别是在《米切尔报告》和《特尼特方案》被搁置之后,美对事态的看法更加消极。用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赖斯的话说,“美国不能使一块石头变成面包”,不能一夜之间创造奇迹。

绍先:美国是缓解中东紧张局势最关键的外部因素。能不能具体谈一谈美国在巴以冲突中的作用呢?

荣:中东局势的恶化与美的中东政策直接相关。我认为,美作为主导调解人在巴以谈判中采取了不

太负责任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克林顿的“急躁”和小布什的“超脱”造成了今天的巴以冲突僵持局面。

首先,克林顿执政后期,为有所建树,急功近利,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硬将巴以双方领导人拉到一起,进行“孤注一掷”的戴维营谈判,结果谈判失败,导致巴以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并葬送了以色列“温和派”政权。而小布什上台后,非但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反而宣布放弃克林顿的“积极介入”政策,对日益升级的巴以冲突“大撒把”。小布什的超脱政策纵容了以色列,成为巴以冲突的催化剂。其次,小布什顽固坚持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上台后三次会见沙龙,却一直不见阿拉法特;对以色列的强硬报复政策和“定点暗杀”政策持默许态度;在联合国否决向冲突地区派驻国际维和力量的议案,并与以一起退出在南非德班召开的联合国世界反种族主义大会。小布什的政策无异于鼓励以色列政府的强硬立场。第三,小布什政府的消极态度源于其保守、利己的对外政策思想。他始终认为克林顿为巴以和谈如此付出,却所得无几,做的是“赔本买卖”,希望本届政府在中东将主要精力放在处理与能源有关的问题上。第四,小布什不积极调解巴以冲突还源于其对冲突的基本估计。美国认为,巴以冲突虽不断升级,但尚不致超出巴以本土范围,以色列能控制住局势,巴勒斯坦无力长期对抗下去,何况阿拉法特不愿失去已到手的和平成果,会竭尽全力争取和谈。如果以色列行动过火,美又有足够能力出面阻止(如在以暗杀了巴解“人阵”总书记后,鲍威尔连续给以巴双方领导人打了6次电话,以有所收敛)。

绍先: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呢?比如是说石油。

宿:我来谈谈石油因素。中东地区是个不同寻常的地方,一直埋藏着诸多冲突和不安的种子。在“全球化”、“历史终结”、“民族国家消亡”、“主权让渡”以及各种“反全球化”的口号响彻全球的今天,这一地区似乎不为所动,依然沉迷于旧的时代里。有关这一地区的新闻报道中,充斥着民族仇视、原教旨

主义、自杀性炸弹、谋杀、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和报复行动之类的词汇。中东地区拥有全世界已探明的石油储备的 64%，在人们的意识里存在着一种“石油情结”，认为中东似乎掌握着世界经济的生杀大权，中东地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往往会触及国际经济学家们敏感的神经。1973—1975 年和 1978—1980 年的两次石油冲击，对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73 年沙特阿拉伯每桶原油的价格只有 2.41 美元，阿拉伯国家实行禁运后每桶原油的价格很快涨到 10.73 美元。在第二次石油冲击中，每桶原油的价格从 1978 年年初时的 13.34 美元上涨到 32.81 美元。一般认为，西方经济战后的“黄金时代”是被第一次“石油冲击”所终结的，而第二次“石油冲击”则是导致 80 年代初西方经济陷入普遍性衰退的“罪魁祸首”。

但奇怪的是，在世界经济转趋低迷的今天，人们特别是美国佬为什么对发生在世界经济命脉附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流血冲突无动于衷呢？而且，更有甚者，与以往不同，国际经济学界对此次中东危机也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和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最新发表的世界经济形势报告中，甚至都没有提到中东危机。

实际上，今天的世界经济与 70 年代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技术进步，能源的利用效率大大提高了。据估计，西方发达国家单位产值所耗石油只有 70 年代时的一半。而且，今天的世界经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也已明显降低。1973 年时，全世界 37% 的石油来自中东，而目前这一比重约为 28%。在美目前消费的石油中，约 50% 靠国内供应，其余大部分则来自加拿大、委内瑞拉、墨西哥和南非等国，只有约 18% 来自中东。美麻省理工学院的能源问题专家托马斯·李(Thomas Lee)曾很明确地下了这样一个结论：石油输出国组织早已不再有能力阻断美国的石油供应了。可以说，美目前对中东的政策，主要是从地缘战略方面来考虑的。此外，石油问题的核心是价格而不是供应。据估计，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目前世界市场上的石油价格比 70

年代初期还要低些。过去一些年来没有出现全球性的高通货膨胀，就与石油价格偏低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从长远来看，维持中东地区的稳定对世界经济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只是现在巴以局势的动荡尚远远不足以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构成威胁。

### 海湾乌云遮望眼

绍先：我们都注意到，小布什上台后，对愈演愈烈的巴以流血冲突迟迟无所动作，而在执政尚未“满月”时却匆匆轰炸了伊拉克。迄今为止，布什政府对伊的空袭已达 10 多次。结果，中东地平线上出现了“奇特的风景”：一面是巴以流血冲突双方打得不可开交，一面则是美英忙于轰炸伊拉克且乐此不疲。显然，巴以冲突和海湾地区的风云变幻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关联。

赵：美英空袭伊拉克与巴以冲突升级之间的确有一定的关联。巴以冲突背后是阿以冲突，而伊拉克是阿拉伯国家的一员，而且是十分激进的、对以态度异常强硬的一员。每当巴以矛盾凸显时，伊拉克就会走到前台。因为在伊拉克看来，巴以冲突正是其冲破国际制裁，重树国际形象的良机。人们不会忘记，早在海湾战争期间，萨达姆就曾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以期用阿以矛盾把水搅浑，并在阿拉伯世界煽起反美反以情绪。2000 年，巴以和谈因暴力冲突陷入僵局，加之美忙于大选无暇他顾，萨达姆趁机掀起新一轮反制裁攻势。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伊朗外长哈拉齐、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等先后访伊，数十个国家的飞机载着人道主义物资频繁“闯飞”，伊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大大改善。萨达姆尤其善于打巴以冲突牌。2000 年 11 月 27 日，伊拉克声势浩大地向巴勒斯坦提供援助，50 辆卡车载着大米、面粉、食用油和奶粉从巴格达出发，经约旦运往巴勒斯坦。12 月 9 日，萨达姆主持召开革命指挥委员会和复兴社会党地区领导机构联席会议，宣布向巴勒斯坦提供 10 亿欧元援助，其中 3 亿用于资助在流血冲突中伤亡者的家属，7 亿用于购买食品和药品等必需物资。今年 3 月，伊再次表示向巴提供食品和

药品, 尽管物资奇缺的伊拉克能否兑现诺言颇令人怀疑。与此同时, 萨达姆还号召国民自愿者参加“耶路撒冷解放军”, 准备对以开战, 并在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提议组建阿拉伯联军, 把耶路撒冷从以色列手中夺回来。8 月中旬巴以冲突进一步升级后, 萨达姆下令为巴自杀性炸弹携带者和在起义中牺牲的“烈士”建造一座纪念碑。今年以来, 萨达姆还至少两次将驻扎在巴格达附近的共和国卫队的坦克部队派往伊约边境, 象征性地摆出将与以开战的架势。当然, 伊拉克的种种自我表现, 更多的是一种宣传和政治姿态, 是作给国际社会和美国看的。从军事实力看, 自顾不暇的伊拉克根本无力为巴勒斯坦而战。

巴以冲突和伊拉克问题是美国在中东面临的两大难题, 两者之间如何平衡常常令美国政府头痛。巴以冲突的升级,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伊拉克国际处境的进一步改善。阿拉伯国家对美无视巴以流血冲突、一味严厉打击伊拉克的政策强烈不满, 对伊拉克的同情度日增。今年 3 月 27 日, 阿拉伯首脑会议重点讨论了巴以局势、解除对伊制裁和阿拉伯经济一体化问题。布什加大对伊打击力度, 除了直接削弱不断恢复的伊拉克军事力量外, 也旨在震慑阿拉伯国家及阿拉伯激进势力, 瓦解伊拉克艰难推进的解除制裁进程。但是, 美国的伊拉克政策需要得到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温和阿拉伯盟友的支持, 没有他们的支持, 美对伊政策目标难以实现。而美一味支持沙龙的强硬政策, 已经引起阿拉伯世界的强烈不满, 阿拉伯民众的反美情绪上升, 在刚刚结束的南非德班联合国世界反种族主义歧视大会上美以的孤立处境就是很好的例证(由于阿拉伯国家的一致坚持, 大会宣言草案点名谴责以色列为种族歧视国家, 美以不得不中途退出会议)。美国中东政策的内在矛盾, 决定了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法改变在巴以冲突和伊拉克问题上的两难处境。

高: 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从中东的政治结构看, 阿以冲突与两伊问题都紧密相联。70 年代以来的美国历届政府在制定中东战略和政策时都将两者联系起来考虑, 这意味着, 美国要确保海湾地区的长久

稳定, 就必须向以色列施压, 迫其把 1967 年占领的领土归还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 以平息阿拉伯世界的反以反美情绪, 争取温和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冷战后, 美国的中东政策正是按此思路进行的。然而, 小布什上台后, 美国政府却要将海湾的问题与阿以冲突分割开来考虑, 不愿使美对伊拉克的政策成为巴以暴力冲突的“抵押品”。小布什和赖斯都认为, 现在已经不是 70 年代, 阿拉伯国家已无石油武器和昔日的军事力量可资利用, 美大可不必太多顾及阿拉伯国家对美实行“双重标准”的不满。

### 未来: “战”难, “和”更难

绍先: 近来, 伴随以色列重新占领巴自治区及准备应付局部战争的军事计划曝光和沙特阿拉伯驻英大使关于阿以可能一战的文章发表, 国际社会关于中东将爆发新的阿以战争的说法不径而走, 一些媒体还将埃及精锐部队第三军已开赴西奈的传闻作为佐证。实际上, 目前根本不存在爆发中东战争的条件, 关于阿以战争的传闻充其量只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以色列对局势的发展感到担忧, 根据以往的经验, 不排除军方确实已经作过一些最坏的考虑; 二是反映阿拉伯世界的愤怒和期待, 沙特大使关于阿拉伯国家“不是不可以考虑一战”之说在阿拉伯世界极具代表性。

荣: 巴以冲突演变为地区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到目前为止, 冲突的性质仍是“谈判桌下的激烈较量”而非生死决斗。促使冲突性质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内外条件都不具备, 它仍将是低烈度的、局部性的暴力冲突, 冲突范围也难超出巴以之外。主要理由是: (1) 国际大环境已完全改变。美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 在中东牢牢占有主导地位, 俄已不具备与美竞争的實力。50—60 年代盛极一时的泛阿拉伯主义也早已被现实的国家利益取代, 阿拉伯联手抗以的基础已不存在。(2) 以色列作为强者是冲突的主导方, 其政策选择决定着冲突的走向。目前, 沙龙虽然强硬, 但并未放弃和平努力, 其手法是利用强有力的军事打击彻底教训和制服巴勒斯坦人, 使阿拉法

特加大对内部的控制,并降低“过高”的要价。而且,以温和派势力正在上升,冲突进一步升级后,沙龙的支持率已明显下降,工党(议会第一大党)对沙龙也形成较大牵制。更何况重新收回巴自治区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3)巴勒斯坦作为弱者,根本无力谈及战争。巴以根本是不同等级量的对手,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军事大国,而巴勒斯坦没有正式军队,仅有的警察部队也只装备轻武器,“石块起义”和恐怖暴力袭击是其最有力手段。而且,阿拉法特依然能够控制局面,不会允许和平成果轻易丧失。(4)阿拉伯多数国家虽积极为巴提供政治、道义和经济支援,但不可能联手出兵讨伐以色列。在埃及准备将第三军开进西奈半岛的传闻在西方媒体刊出后,埃及官方迅速出面否认,称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向西奈派兵。叙利亚也一直对流血冲突保持低调。(5)美国等大国均不希望中东爆发战乱。对美来说,中东稳定当然好,“动而不乱”局面美也可以接受,美“东遏两伊,西促和谈”的政策构想并未改变。美国手中有足够的阻止战争的手段。俄罗斯虽想重返中东,但更多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一个稳定的中东符合俄的利益,普京已表示将与美配合联手制止局势继续恶化。欧洲大国更不希望中东爆发全面战争,且企盼尽快解除对伊拉克的制裁,使其能获得更多的经济红利。为此,欧洲国家积极参与调解巴以冲突。总之,尽管冲突不断升级,但迄今巴以仍坚守着“斗而不破”的政策底线。目前双方仍都在抓和谈大旗,谁都不愿成为破坏和平进程的罪人。

赵:我也认为巴以爆发全面战争机率不大。巴以双方从数十年阿以争端中认识到,谁也不可能通过战争手段将对方消灭,和谈是惟一解决问题的途径。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在访问埃及时明确表示,中东不会爆发战争,以色列政府将继续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进行谈判。但期望近期内双方实现完全停火、恢复和谈并取得进展也不现实,双方低烈度的军事冲突短期难以结束。

高:有几个基本事实是局势如何发展都改变不了的。第一,只有和谈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从以色列 1948 年建国至今,战争与和谈的历史都已证明了这一点。虽然目前以国内民众多数支持沙龙的“打杀”政策,但人民最终需要的是安全,当这种政策只会给他们带来巴人的自杀式炸弹时,强烈的恐怖心理将动摇他们的心理防线,使他们改变立场。历史的经验已经反复说明了这一点。第二,“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得到包括以色列人民在内的广泛认同。人们认识到,只要以色列继续坚持控制 1967 年战争中夺取的土地,就没有任何一届政府能够向人民提供安全保证。第三,阿以和平进程是充满曲折的漫长过程,在 1979 年埃及和以色列实现和平后,中东和平进程就走上了不归路,特别是在 1993 年巴以签署《奥斯陆协议》后,和平进程真正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第四,美国不可能长期置身事外。美国在中东具有至关重要的利益,尤其是冷战后中东与中亚天然存在的地缘、文化联系更使中东的战略地位变得尤为重要。可以预期,布什政府最终仍不得不步上其前任的后尘,积极介入到中东和平谈判中去。

绍先:综合而言,中东局势未来的走向似可概括为:“战”难,“和”更难。军事专家萨伊各博士预测未来的局势发展可能出现三种情况:持续性的游击战争;以军对巴权力机构的毁灭性打击;巴权力机构在以色列压力下被迫解体。可以设想,如果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不能得到应有的限制,上述任何一种预测都将可能成为事实。中东沉积了太多的恩怨和血泪,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和磨难,也失去了太多的发展和振兴机会。在人类社会迅猛发展的新世纪,我们真诚希望,阿以早日了结百年恩怨,实现全面持久和平,共建繁荣与发展的新中东。○

(责任编辑:黄昭宇)